

公安派孕育期探析

王承丹

(厦门大学文学院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〔摘要〕公安派在湖北公安时期属于它的发生期, 相对于这个流派的整个兴衰演变过程, 这一时期仍显得意义重大。在公安派的发生期中, 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兄弟是主要成员, 他们自己尚无足够的能力组织起诗文流派, 而主要是接受家族成员和外祖父及舅父的影响, 同时, 三袁兄弟也在努力进取以图将来的更大发展。

〔关键词〕明清诗文; 公安派; 袁士瑜; 龚大器; 李贽

〔中图分类号〕I207.2 〔文献标识码〕A 〔文章编号〕CN35-1206/G4 (2003) 04-0015-04

所谓公安派的孕育期, 是指公安派在湖北公安时期, 即以袁宗道、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为主要成员时期。相对而言, 公安派的壮大、兴盛乃至衰微阶段似乎更受研究者关注, 可是, 作为对整个流派的全面深入探讨, 公安派的孕育期同样是不可轻忽的。本文即撮要对公安派的孕育期状况加以探析, 以见其重要性所在, 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。

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家族背景。先看袁氏家族的相关情况。由于谱牒无存, 三袁高祖以上的线索难以详悉, 大略可知的是, 他们的远祖本初公, 于明初以廪贡任黄州蕲水县教谕, 并于洪武末年移籍荆州公安县。三袁的乡梓之地, 荆江边的公安县, “是历史上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垂青和文人墨客留恋的地方”,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到过公安县, 并有《公安怀古》诗, 诗中写到“吕蒙营”、“刘备城”。杜诗中的三国故地, 以及他本人登临的遗迹, 三袁在世前后还隐约可见。自古至今, 公安县确也涌现了一些名垂史册的人物, 如东晋名士车胤、佛教天台宗的始祖隋代高僧智顗等, 距三袁相去甚近的明代弘治年间, 公安县还出了兵部尚书王弼和户部尚书邹文盛。^{[1] (P295)} 与人文状况相比, 公安的自然景观也颇有特色, 三袁兄弟对此一直魂牵梦绕, 难以忘怀, 每当他们在外面的世界遭受挤压与不幸的时候, 这里就成了修养身心积存力量的去处。因此, 作为诗文流派的公安派, 不仅它的创始者、领袖人物生于公安, 长于公安, 因公安而得名, 而且公安一地为一派流派的孕育发生提供了最早的物质和精神支持。从这一点上说, 公安县对于公安派的孕育发轫,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直接给公安三袁施以影响的是他们的父亲袁士瑜, 间接因素则是他们的祖父袁大化 (左溪公), 这种影响又主要体现在读书上进, 通过科举之途走出公安一隅。从袁宏道的追忆文字中, 能够印证这种说法, 他说:

余先世自黄移南郡, 盖武胄也, 至王父左溪公行而族始著, 课子弟章句业, 冠里中。至余大人行, 始文冠诸生。至余兄弟辈, 而魁海内者一 (袁宗道), 籍金国者二 (袁宏道、袁中道), 举贤书者一, 游槐门黄舍者几四十余人。计高祖有伦公至余辈凡五世, 族指? 几三千许, 族兄弟子侄, 或不能学; 骑而遇道上, 不能貌, 或不下, 亦下里之冠族也。^{[2] (P1175卷三十九《余大家祠墓志》)}

显而易见, “文冠诸生”的三袁之父袁士瑜很值得注意。袁士瑜, 自号七泽渔人, 生于嘉靖二十年 (1543年)。袁士瑜从小就喜读诗书, 十五岁参加童子试, 一举冠榜首。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考试, 袁士瑜是袁家数代以来第一人, 这首先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表率。但是, 表率的作用仅此而已, 在科举之路上, 袁士瑜未能走得更远, 童试后的数十年中, 他屡战屡北, 终身为老秀才。宏愿未遂, 袁士瑜转而把希望寄予三袁兄弟身上, 他不仅以父亲的殷殷之情督责三袁读书应举, 还参加三袁的文社活动。更为重要的是, 袁士瑜亦是儿辈著书立说的先行楷模, 他有《尚书解义》行世。“读三袁先生之书, 岂可溯其流, 而忘其源哉!”^[3] 溯流探源, 袁士瑜是直接给予三袁较大影响的人物。

公安三袁聚众成派, 彪炳史册, 其早期影响还来自父亲袁士瑜之外的其他袁氏家人, 这些人甚至包括罕被提及的祖母辈女性人物。如果说袁士瑜对三袁的影响是通过科举走向广阔的外部世界, 以及著书传世的话, 那

〔收稿日期〕2003-11-28

〔作者简介〕王承丹 (1965-), 男, 山东苍山人,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, 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

么,其他袁氏家人则对他们的人格形成起到了定型作用,这便是袁家的积善、慈爱美德。

袁氏家族的乐善好施美德,在三袁祖父袁大化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。袁家到袁大化时,生活已比较富裕,他生性慷慨,注重然诺,对穷困之人多有周济,又能做到礼让他人,故而在乡间赢得了“退让君子”的好名声。嘉靖二十三、四年间,公安一带发生大饥荒,他“出母金以千计,出谷以万计”,周济灾民,然后“取其券焚之”。^[2](P1175卷三十九《余大家附葬墓石记》)和^[4](P754卷十八《吏部验封司袁宏道先生行状》)

袁大化是这样,他的妻妾也是如此。他的嫡妻邱氏,妾余氏、詹氏、舒氏,三袁对她们,尤其对后三人,感情十分深厚,并屡屡见诸文字。袁宏道作为公安派的领袖,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。走出公安一隅的他,嫉恶如仇,见地深透,在那黑暗的世道,敢冲决网罗,愿做“末季先驱”^[2](P763卷二十二《答李元善》),自愿放弃仕途而追寻自由自适,所有这一切,都能让人感受到祖母辈善行美德的激励。袁宏道曾慨叹:“谷升世出贤女,庚子之捷三人,余家兄弟先后得军备雋,五人皆甥于谷者也,偶然耶?抑地灵耶?两村相隔一事水,当为将来佳话。”^[2](P1184卷三十九《司马潘人墓铭》)这段文字中,袁宏道把司婢母的贤德与袁氏家族科举发联联系起来,视为佳话,显然是有感而发。事实上,完成这种“佳话”的,并不仅仅是一二个女性。

三袁所遭逢的时代,女性无疑受到更多不公与重压,然而,她们在礼仪伦理镣铐下的艰难生存中,也往往展示着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,其感奋激发作用,与男权话语背景下的一极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在袁宏道的笔下,他的余氏祖母、詹氏祖母是那样感人至深,她们为她们写下深情的文字,为她们而粪土官位,更为她们而卓厉奋发。^[2](P1178卷三十九《詹大家圻记》、P1175卷三十九《余大家附葬墓石记》、P313卷七《去吴七赋》)

二

龚氏父子,即三袁的外祖父龚大器,他的儿子龚仲敏和龚仲庆兄弟,对袁氏昆季的影响也十分巨大。与袁氏家族的成员相比,龚氏父子对三袁兄弟的滋养更加具体而微。在公安派孕育期,龚氏父子都曾给三袁以文学乃至文学以外的滋养。在公安这片文化荒地上,科举得捷的龚氏父子率先带给三袁外面世界的新鲜信息,这对于三袁,其意义自然不可小觑。龚氏父子,尤其是三袁的两位舅父,虽然没有跻身于公安派成员的行列,但他们确又是这一流派热心的支持者和自始至终的呐喊助威者。龚氏父子作为三袁早期的监护人和督导者,应是他们对整个公安派作出的最大贡献。看一下袁宗道对此时公安文化荒漠状态的描述,这个问题就会随之清楚了许多。袁宗道说:

吾邑自洪、成以来,科第不乏。士大夫之有行业者,亦复不少,独风雅一门,秦芜未辟。

士自蒙学以至白首,簏书中惟蓄经书一部,烟薰《指南》、《浅说》数帙而已。其能诵十科策几段,及程墨后场几篇,则已高视阔步,自夸曰奥博。而乡里小儿憚之,亦不翅扬子云。

余为诸生,讲业石浦,一耆宿来见案头摊《左传》一册,惊问是何书,乃溷帖括中?一日,偶感兴赋小诗题斋壁,塾师大骂:“尔欲学成七洲耶?”吾邑独此人能诗,人争嫉之,因特举为诫。故通邑学者,号诗文这“外作”,外之也者,恶其妨正业也。至于佛、《老》诸经,则共目为妖书。而间有一二求通其说者,则诟之甚于盗贼。此等陋俗,盖余廿年前所亲见。而今里中三尺小儿所哦者,非两汉即六代。无论举义,即尺牍往来,具有古意。《道德》、《南华》,以及竺典,亦多涉猎。挥麈援毫,往往有致。衣冠文物,殆斌斌等于三吴矣。^[5](P128卷十《送关山母舅之任太原序》)

这样的土壤,显然不适于诗文种子的萌芽生根。那么,三袁昆季又是怎样成长壮大并使文坛侧目、奉之为长的呢?最早的原因之一是龚氏父子的启迪,而龚大器称得上是三袁文学的蒙师。

龚大器是三亲属中第一个读书为儒,并最终走上仕途的人。他为官平易近民,得“龚佛”之号。他宦游各地,见多识广,还能即兴赋诗。龚大器七十岁致政归里后,亲自组织南平社,被推为社长,常“与诸子诸孙唱和”^[4](P697卷十六《龚春所公传》)。对于年少的三袁兄弟来说,他们的文学启蒙即来自于此。读书做人,科举为官,作诗唱和,从以上诸方面来看,龚大器都堪称公安三袁少小时的楷模。走出公安,走进外部广大世界的三袁兄弟,他们的人生态度、文学追求、仕途经历,等等,也大都能看到龚大器的影子。

具体到对公安三袁影响的深刻程度而言,龚仲敏、龚仲庆的作用远远超过乃父。袁氏兄弟自小就与诸舅交往频繁,不仅生活上受到舅父的关爱,而且相互间还能没有拘束地切磋学问,商讨心得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二龚与三袁多数情况下更象是朋友和同志,而不仅仅是靠亲情血缘维系的关系。三袁跃起文坛,声名大噪之后,与舅父的往来、唱和也未见稀疏,从他们留下的诗文牍札等的文字中推断,龚氏兄弟由始至终都是三袁文学活动的支持者。在三袁的心目中,舅父龚惟学对他们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,袁宗道就曾道出深衷:

宗道兄弟三人,游于都门,得与海内士大夫往还,二三名流俱不以趣趣庸陋见弃,推而附之大雅之林。其

友之相习者戏谓：“南平一片黄茆白苇，何得出尔三人！”盖谬疑开辟莽自我兄弟，而不知点化熔铸，皆舅氏惟学先生力也。

先生少从方伯公宦四方，独取异书秘文以归。归偕驾部弟闭门读诵。驾部公得隽后，先生筑茆城南，号曰阳春社。一时后进入社讲业者如林，不肖兄弟亦其人也。自有此社，人始知程墨之外，大有书帙；科名之外，大有学问。而先生又能操品藻权，鼓舞诸士。诸士穷日夜力，勾搜博览，以收名定价于先生。以故数年之间，雅道大振，家操灵蛇，人握夜光。尸而祝之，当首先生矣。顾宗道辈得先生不龟手之药，先后见收，而先生不免于泝澌熵，则先生之遭也，遇不遇不足以概先生。^[5]（P128卷十《送关山母舅之任太原序》）

龚惟学是龚大器次子，袁氏兄弟称他为“惟学舅”。他少有俊才，博览群书，文章也写得很好，他著的《嘉祥县志》获“详赡典则”之美誉，为李贽、焦竑这样的公安派师长辈人物所称赏。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，三袁能从“一片黄茅白苇”的公安相继脱颖而出，多赖于龚惟学的“点化熔铸”。龚惟学创立的阳春社与其父龚大器的南平社一样，不仅聚拢了一大批有志于诗文创作的文人雅士，重要的是为日后三袁聚众成派做了较早的铺垫。袁宗道还曾说，是龚惟学让他“知瓶甌外别有天地”，再经过自己的钻磨，才得以“从覆中纵身而出，见日月光”^[5]（P134卷十《嘉祥县志序》）。显然，龚惟学的影响并非惠及袁宗道一人，袁宏道和袁中道同样受益良多。

三袁的“惟长舅”也很值得注意，他爱护、督促年少的三袁，其后又积极参与他们的文学活动。袁中道曾记其生平大略：

仲庆字惟长，万历己卯年举于乡，明年成进士，授行人，行取御史，以建言谪磁州判，终兵部郎。竟淹抑不获大用。公恺悌爱人，如其父兄。生平不喜言人短，见人言人隐事，则颦蹙曰：“尔亲见之耶？”其浑厚皆天性也。为人沉静，独喜蓄书，至数万卷，躬身校讎。司理汝南时，无所事事，惟遣善书吏数十人，录陈文耀所藏古今书数百部。中年绝意仕进，日以读书为事。大爱种花，所植异花草数百种。曾于河北见垂柳，婆娑委地，即遣人取一枝回种之，其好事如此。晚年断葷血，亦以无疾卒。有《遁庵集》。^[4]（P697卷十六《龚孝所公传》）

龚惟长的情趣、爱好等，在三袁身上都能约略找到对应之处，他喜蓄书、善读书，还留有《遁庵集》，这是其他三袁长辈所无法比拟的。

综上所述，龚氏父子对公安三袁的影响是全面、深刻的，就其突出处而言可侧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龚氏父子以自身的表率，为三袁通过科举之途走出公安一隅做了更为具体的垂范；其次，成立诗社，组织诗文创作活动，为三袁创立公安派主盟文坛提供实践的机会；复次，使三袁更早一些接触到儒、道、佛等多方面的文化思想资源，为其学养的丰富、人格的定型打下了基础。

三

在公安派的孕育期中，三袁昆季的早慧以及个人或共同努力都十分重要，因此，同样也很值得关注。

三袁都是早熟的少年，尤其在文学才能方面，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超人颖悟能力，这应是他们日后走上文坛并聚众成派的先兆。袁宗道“生而甚慧，十岁能诗，十二列乡校”。他有远大的志向，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更是潜心钻研，袁中道曾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：

见乡先达祠，曰：“吾终当俎豆其间。”二十举于乡。不第归，益喜读先秦、两汉之书。是时，济南、琅琊之集盛行，先生一阅，悉能熟诵。甫一操觚，即肖其语。弱冠，已有集，自谓此生当以文章名世矣。^[4]（P707卷十七《石浦先生传》）

袁宗道在当时文苑站稳脚跟之后，曾对文复古派作家大加挹伐，比如，他针对后七子盟主王世贞及其《艺苑卮言》说：“一从马粪《卮言》出，难洗诗林如骨尘。”^[5]（P63卷五《同惟长舅读唐诗有感》）但是，这显然不能否定他曾经热衷于模仿复古派诗歌的事实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，在确立公安派的创作理论之前，袁宗道在文学追求上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。

关于袁宏道，袁中道的记载也颇为详细：

少时即具侔年之觉。年四岁，着新履，舅龚孝廉呼谓之曰：“足下生云。”先生即应声曰：“头上顶天。”孝廉大骇。八岁，龚太孺人即世，先生不数哭，一哭即痛绝，人以其有隐慧焉。总角，工为时义，塾师大奇之。入乡校，年方十五六，即结文社于城南，自为社长。社友年三十以下者，皆师之，奉其约束，不敢犯。时于举业外，为声歌古文词，已有集成帙矣。^[4]（P754卷十八《吏部翰林司袁宏道先生行状》）

与兄长袁宗道比，袁宏道的少时“颖慧”似乎更预示着他将大行于未来。更重要的是，袁宏道组织城南社，自为

社长,为他成为公安的领袖提供了最早的实践机会。

袁中道也不比二位兄长逊色,他“十余岁,著《黄山》、《雪》二赋,五千余言”^[6](P568丁集“袁仪制中道”条)。二十三岁的时候,袁中道的《南游稿》问世,成为公安派进入兴盛期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。

一方面,在袁氏家族成员、外祖父及舅父们的影响下,另一方面,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及人生阅历、文学知识的丰富,三袁兄弟在参与阳春社、南平社前后,也开始独立组织诗文结社活动。这些结社活动,使他们得以聚集一些文朋诗友,交流切磋诗文创作的体会,实际上成为公安派崛起前组织文学流派的有益尝试。三袁独立组织的第一个社集活动是上文提及的城南社,它对袁宏道尤其意义非凡,因为这是他正式戴上公安派的桂冠之前被人尊之为长的第一次。公安派进入兴盛期前后,在袁宏道写给昔日社友的信函及其他追忆文字中,都能看出以前的公安结社经历对他的深刻影响。他的两首诗提及结社往事,可资参照,第一首是:“宿昔城南约,苍茫十载情。交游悲喜尽,文字揣摩成。古屋繁阴入,空阶冻鸟行。终年唯搦管,辛苦是书生。”^[2](P34卷一《社中》)第二首为:“所至成三笑,居然似七贤。社开正始后,诗数中兴年。一代称同轨,千秋顾执鞭。古来藏二酉,不必大都传。”^[2](P40卷一《示社友》)

公安派有一个显著特点,即它与明代乃至整个后期古典文化史上心学思潮结缘甚深,这种特点在它的孕育期就已经有所显现出来。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,三袁昆季一点也没有放松对当下新思潮的追寻与探求,这不仅对当时,就是对以后的公安派,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。袁宗道最先破除“荆楚”之人“儿女情多,风云气少”^[5](P129卷十《华镇抚序》)的陋习,通过科举之途走出公安僻地。因此,袁宗道在三兄弟中也是最早接触到外部世界新思潮的,然后将其精蕴引介给袁宏道和袁中道,接下便是他们在一起共同商证、参求。对此,袁中道说:

先生官翰林,求道愈切。时同年汪仪部可受,同馆王公愬,萧公云举,吴公用宾,皆有志于养生之学,得三教林君良背行庭之旨,先生勤而行焉。己丑,焦竑首制科,瞿公如稷,官京师,先生就之问学,共引以顿悟之旨。而僧深有为龙潭高足,数以见性之说启先生,乃遍阅大慧、中峰诸录,得参求之诀。久之,稍有所豁。先生于是研精性命,不复谈长生事矣。是年,先生以册封归里。仲兄与予皆知向学,先生语以心性之说,亦各有省,互相商证。先生精勤之甚,或终夕不……至是,始复读孔孟诸书,乃各至宝原在家内,何必向外寻求。吾试以禅论儒,使知两家合一之旨。遂著《海蠡篇》。既报命,旋即乞归。七八年间,先生屡悟屡疑。癸巳,走黄龙龙潭问学,归而复自研求。^[4](P707卷十七《石浦先生传》)

袁中道所说的“走龙潭问学”,即是公安三袁对他们最为钦敬的师长李贽进行谒访的事情,这是件意义非凡的事件,从大处说,它全面影响了明代思潮的走势,从小处看,它是公安派孕育期的终结标志,由此而后的公安派,再也不是公安一地的事情,而是从此进入了文学乃至文化史的公安派了。还是袁中道的记述最能说明问题:

戊子(万历十六年),举于乡,主试者为山东冯卓庵太史,见其后场出入周秦间,急拔之。明年,上春官。时袁宗道方为大史,初闻性命之学,以启先生。先生深信之。下第归,袁宗道亦以使事返里,相与朝夕商榷。索之《华》、《梵》诸典,转觉茫然。后乃于文字语言意识不行处,极力参究,时有所解,终不欲自安歧路,恃燭火微明,以为究竟。如此者屡年,忘食忘寝,如醉如痴。一日,见张子韶论格物处,忽然大豁,以证之袁宗道。袁宗道喜曰:“弟见出盖缠,非吾所及也。”然后以质之古人微言,无不妙合,且洞见前辈机用。白雪田中,能分鹭鸟;红罗扇外,瞥见仙人。一一提唱,聊示鞭影,命名曰《金屑》。时闻龙湖李子冥会教外之旨,走西陵质之。李子大相契合,赠以诗,中有云:“诵君《金屑》句,执鞭亦忻慕。早得从君言,不当有《老苦》。”盖龙湖以老年无朋,作书曰《老苦》故也。仍为序以传。留三月余,殷殷不舍,送之武昌而别。先生既见龙湖,始知一向掇拾陈言,株守俗见,死于古人语下,一段精光,不得披露。至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,巨鱼之纵大壑。能为心师,不师于心;能转古人,不为古转。发为语言,一一从胸襟流出,盖天盖地,如象截急流,雷开蛰户,浸浸乎其未有涯也。^[4](P754卷十八《吏部验封司袁宏道先生行状》)

作为公派的领袖,袁宏道从此得时大行,公安派的孕育期随即宣告结束,开始壮大兴盛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李寿和. 三袁的家乡和家世 [A]. 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 [C]. 武汉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87.
- [2] 钱伯城. 袁宏道集笺校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1.
- [3] 公安县志·袁士瑜, 清同治版.
- [4] 袁中道. 珂雪斋集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.
- [5] 袁宗道. 白苏斋类集 [M]. 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.
- [6] 钱谦益. 列朝诗集小传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59.